



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



焦天龙

(美国毕士普博物馆 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

摘 要:文化概念在西方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被扬弃的变化过程。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

关键词:文化, 风格, 西方考古学

Abstract: From the absence to the dominance and then being abandone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Western archaeology has undergone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ver the past century. "Culture" is no longer a critical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aeology. Style, identity and ethnicity have become the focal concepts for archaeologists to study the regional variations in material cultur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boundary. In comparis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a discussion of identifying cultural elements 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Chinese archaeologists do not have any debates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e, nor do they pay any attentions on the discussions of style in Western archae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ulture concept in Western archaeology should be treated seriously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Key words: Culture, Style, Western Archaeology

“文化”概念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最为深远,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在1959年夏鼐先生根据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认识之前,文化概念在中国考古学中的使用相当混乱,命名方式很多,对如何定义考古学文化,并没有明确的认识。1959年,夏鼐先生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界定的三原则,即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有一组独特的遗迹和遗物,这组遗存经常共存于一定的时期,有一定的分布地域^①。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定义标准一直为中国考古学界所坚持,并成为“区系类型”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纵观西方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被扬弃的变化过程。

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但是,这绝不是说西方考古学者不关心考古材料的区域特征。相反,对物质文化所反应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的探讨,一直是当代西方考古学常盛不衰的课题。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已不再是文化,而是“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因此,追溯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过程,或许对于中国考古界重新思考这一重要概念有所启示。

一. 无“文化”的西方考古学(19世纪早期-20世纪初)

19世纪初期,当西方考古学还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考古学家们是不知“文化”(culture)为何物的。

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古代的遗存就是要建立起相对的年代顺序,进行分期。所以,在汤姆森(C.J. Thomsen 1788~1865年)1836年提出石器—青铜器—铁器三期系统,并由沃尔索(J.J.A. Worsaae)以野外材料证明后不久,法国考古学者们就根据他们的发掘,提出应把石器时代分成早、晚两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比汤姆森的石器还要原始的石制品。1865年,英国考古学家拉布克(John Lubbock 1834~1913年)就正式提出了“新石器”(Neolithic)和“旧石器”(Paleolithic)两个名词,三期说变成了四期说^②。

1872年,英国学者何德·宛斯特普(Hodder Westropp)认为在新、旧石器时代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过渡阶段,他把这个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 Period)。尽管他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影响不大,后来甚至曾被一度遗忘,但在本世纪初G. Clark的专著《不列颠的中石器时代》出版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一时代^③概念。在上世纪末,意大利、匈牙利、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考古学家几乎同时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也有一个过渡阶段,意大利的学者称这个时代为“后新石器时代”(Eneolithic Period),而法、英、德和匈牙利的考古学家则把它叫做“红铜时代”(Copper Period)。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内,欧洲的考古学先驱们就急急忙忙地把汤姆森的三期系统翻了一番,并奠定了现代考古学时代划分的基础。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每个时代之内进行了细致的分期。1869年法国考古学家G. 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借用地质学命名的方法,以首次发现的遗址为名称把法国旧石器时代分成莫斯特、梭鲁特、奥瑞纳、马格德林四期。后来他们又对这一分期方案进行了修改,按年代早晚把法国的石器时代分为六期:1)特奈期、2)舍利期、3)莫斯特期、4)梭鲁特期、5)马格德林期、6)罗本豪森期。188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 1843~1921年)进一步发展汤姆森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并成功地建立了欧洲青铜文化的年代序列。根据共存器物的分期排队,蒙特留斯将欧洲的青铜时代分成六期。在后来的十年中,蒙特留斯又将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分成四期,铁器时代分成十期^④。

上面叙述的仅是各种分期方案中的较有影响的几种,实际上,当时的分期方案是很多的。在1875~1900年之间的25年里,关于不同时代的分期方案就有近十个。而且,分期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些学者甚至以古生物的名称来命名考古学的分期。对这一

时期的考古学家来说,详细区分人类历史不同的时间阶段,似乎就是考古学的任务。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只倾注于纵向的排列研究。横向的,即考古遗存地域差异性的现象也早就被注意到了。早在1858年和1873年,汤姆森的后继者沃尔索(J.J.A. Worsaae, 1821~1885年)就提出,应该首先把青铜时代的欧洲分成不同的地域,然后才能进行研究。法国考古学家商特赫(Chantre)在其《'Age du Bronze'》(《青铜时代》)一书中,则更进一步把青铜时代的欧洲分成三个地区,即:乌克兰、多瑙河和地中海地区。卡皮唐(Capitan)在研究法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时,把它们分成五组^⑤。

这些探索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考古遗存的区域性差异问题。就不同类型的遗存所进行的上述概括性的地理划分,反映了他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作的努力。但是,他们还认识不到,这些不同的区域所反映的实际上乃是不同人类群体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没有提出一个有影响力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区域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19世纪的考古学称为“无文化”的考古学。

二.“文化”概念的引用及其意义(1900~1920年)

摆在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们面前的任务,除了继续建立更加细致的编年体系外,又多了一个新的课题,即他们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如何对待古代遗存的地域共性和差异性。发掘资料的增加,表明考古学的分期与地质分期是不同的,前者不可能向后者那样具有全球意义,甚至在全欧洲也不是统一的。相近地区人类遗存的相似性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使当时的考古学家们陷入了这样一种矛盾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期名称却又不能代表着普遍的文化内涵。这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相同地区的共同性的现象,迫使考古学家用一个适当的名词对他们进行描述和分析。“文化”的概念便因此而被引用到考古学中来了。

英国考古学家G. 丹尼尔(Daniel)在分析“文化”概念被引用到考古学中时,列述了四个方面的原因^⑥:

第一,原来认为属于不同时代的遗物,后来发现竟然共存存在一个地层中,这是导致“文化”概念被引入的最直接原因。1909年,步日耶(Breuil)和奥伯迈赫耶(Obermerier)在西班牙北部的洞穴中发现典型的阿齐尔(Azil)堆积与典型的塔登诺瓦(Tardenois)石器的人工制品共存在一起。在这之前,人们以为阿齐尔和塔登诺瓦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两个不同时期

期。这种现象使当时的人们大惑不解,甚至引起了对三期系统的怀疑。

第二,考古发掘从原来有限的几个地点,尤其是从法国扩展到了全欧洲,并且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也进行了一些发掘。眼界的扩大使人们认识到,莫尔蒂耶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分期系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

第三,一些史前学家,采用不同于传统考古学家的方法来研究在雅典和近东发掘的材料,在理论上对传统的考古学进行了冲击和补充。例如,施里曼(Schliemann)在研究迈锡尼(Mycenaean)出土的东西时,并没有把它们纳入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的框架中去,而是直接称它们为“迈锡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阿瑟·伊文斯(Arthur Evans)也把他在诺索斯(Knossos)发掘到的东西叫做米诺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而且,地中海东岸这些文明除了在其内涵与复杂程度上与西欧和北欧的同时期有所不同外,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这就使考古学家意识到,他们常常描述为同时代的各个“期”,实际上就是“文明”的不同类型。既然如此,史前学为什么不能把诸如“莫斯特期”改称为“莫斯特文明”呢?

第四,一些考古学家吸收了当时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思想。当时,文化的概念在人类学中已被普遍使用,它不仅指当代原始民族中的精神、风格和制度等意识形态的东西,同时也指其工具、房屋等物质形态的成就。20世纪初,正是人类学中历史学派兴盛的年代,德奥历史学派的学者和美国的鲍亚斯(Boas)等发展出了一整套复杂而又系统的“文化地区”理论。他们根据落后民族所使用的物质材料和风俗习惯、信仰、制度等精神方面的东西,把他们分别划归不同的“文化”或“文化群”。这种划分的基础与考古学材料的地域共同性是相同的,只不过一个指当代的,一个是古代的。人类学中用“文化”来命名这种共同性的方法,无疑对当时正在困扰中的考古学家是一个很大的启示。考古研究的深入表明,用单纯的时间序列无法解释的地域共同性现象,如果采用一种既含有时间又含有地域的观念,即文化的观念,则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采用地理学的方法,详细作出各种文化类型的分布图,并且把研究范围扩及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问题也就变得明朗了,原来考古学家在各地所研究的乃是文化序列,而不仅是时期的交替。

学术界一般认为,真正系统将文化概念应用到

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是德国考古学家柯西那(Gustaf Kossinna, 1858~1931年)。在1911年出版的《日尔曼人的起源》(Die Herkunft der Germanen)一书中,柯西那从理论和方法上对“考古文化”概念进行了论述。柯西那的方法是将考古材料和种族等同起来,不同种族所创造的考古遗物是不同的,通过分析考古材料的分布区域,考古学家可以追溯种族的起源过程和扩散范围。柯西那自称这种方法为“聚落考古学”。柯西那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是一个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他的结论是德国北部是印欧语系的发源地,日尔曼人也就是德国人最纯粹的种族,也是最具创造力的种族。他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⑦。

如果抛开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份,从考古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柯西那用文化历史的观点来研究考古材料的方法是具有开创之功的。他所提出的“文化”概念,为考古学界提供了一个解释考古材料时空变化的方法。虽然德国以外的其他欧洲考古学家,几乎全部反对柯西那荒唐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结论,但却接受了他的文化概念。

文化被引进到考古学中,从此便改变了考古学研究的性质。G·丹尼尔在论述这一转变的意义时曾说:“这在史前物质遗存的研究上是一个彻底的变化,它标志着把人类作为一种动物进行研究转变成把人类当成真正的人类进行研究。一句话,就是对史前人类从采取地质学方法进行研究转变为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态度进行研究^⑧。”

三、“文化”概念的发展和成熟(1920~1950年代)

在“文化”的概念刚刚被引入到考古学中时,人们对它还比较陌生,理解也就不可能一致。“文化”有时是指一群或一个地区的遗存,有时则用来指一个遗址;而且当时较普遍的观念是一个陶器就可以代表一个族。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新概念的产生,总要经历一个从不精密到比较科学的过程。

在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中使这一过程告一段落的,便是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 1893~1957年)。柴尔德进一步发展了柯西那的文化概念,但抛弃了其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成份。柴尔德本身对文化的理解也发生过变化。一直到1950年代末期,其文化理论主导西方考古学界^⑨。

当柴尔德开始其考古生涯时,正值考古学处于

重要的转变时期。在1929年出版的《史前多瑙河》一书中,柴尔德第一次明确写道:“我们发现一定形态的遗存——容器、工具、装饰品、葬制、房屋结构——经常出现在一起,这种特征有规律的联在一起的复合体(complex),我们应名之为一个文化群(cultural group)或就是一个文化。我们认为,这种复合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某个族的物质表现。只有在这一尚有疑问的复合体经常地独与某种具体的特殊体制类型的骨骼遗存共存时,我们才可用种族(race)一词来替代族^⑩”。

柴尔德的这一定义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因为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使用文化一词这一问题上,当时较为混乱。文化与族的关系更是模糊不清。柴尔德的定义明确指出了,只有具有一群特定的特征,并经常出现在一起的遗存复合体,才是一个文化,才能代表一个族。他尤其强调了在考古学上“族”与“人种”的严格区别。无疑,在考古学史尤其是在史前考古学史上,这种界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首先指出了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仍然有很大的模糊性;它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把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学的研究联系了起来,指出了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对应关系。尽管柴尔德对这种关系的论述后来又有较大的变动,但在当时对澄清把考古学材料与族乱划等号的混乱局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对种族与民族的区别,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德国法西斯利用考古学材料来吹捧日尔曼民族优越的谬论。从1929年的第一次定义考古学文化到1957年柴尔德逝世,世界各大洲都有了考古发掘,重要的发现层出不穷。柴尔德的伟大贡献就是在掌握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对考古遗存尤其是欧洲的史前遗存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考古学文化的界定便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考古学文化的解释,零散的分布在他的几部重要著作中。对这些论述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可以分成三个不同阶段^⑪。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对考古学文化和族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综合起来,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 考古学文化首先是具有特定特征的类型品(trait)复合体;2. 这种遗存复合体经常共同出现在考古遗址中,有着一定的分布地域,并且是同时代的;3. 这种复合体主要是物质的,但也有许多可以反映精神的东西;4. 这种复合体可以代表某个族,但却不能与种族简单划等号。

尽管柴尔德一生都在讨论考古学文化,但到了晚年,他却对“文化”一词在考古学中的实用性发生了怀疑。他非常担心人们会把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含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混同起来,进而对是否应使用“文化”一词来表示他所指的考古学单位发生了怀疑^⑫。其实,发生这种怀疑的在当时又岂止柴尔德一人!

四、“文化”概念的早期反思:(1940末期~1970中期)

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系统描述,代表了当时世界史前考古学的主流。无论在旧大陆还是在新大陆,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史前学的一重要任务就是要区分文化群和各种民族、寻找它们的差异,活动地区和活动行为。欧美考古学专注于对历史文化特征在时空分布上的研究,以及对这种分布控制因素的研究。考古学家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对考古遗存的排列组合,以建立和区分文化为己任,世界史前考古学便进入了八股式的文化罗列的时代。

但就在这个沉默的局面中,一股激荡的逆流出现了,这只激流首先发端于美国考古学中。美国的一些考古学家高高举起了叛逆的旗帜,向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提出了大大的“?”。问题首先发端于对考古学目的的怀疑。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美洲考古学,主要致力于建立整个美洲大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图,建立完整的文化编年体系。这种基调与当时旧大陆考古学是一致的。但与欧洲考古学依附历史学不同,美洲考古学一开始就与人类学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特殊之处决定了美洲考古学的理论取向不断受制于人类学理论思潮的变化。

在这时的美国人类学中,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和新兴起的以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所谓“文化生态学”是很有势力的两大派别,他们都主要研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反对仅仅对文化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受此影响,考古学界对传统考古学局限于年代排列和文化罗列的狭隘性也开始进行反抗^⑬。

对传统考古学批评最激进的学者是W. 泰勒(Walter Taylor)。泰勒30年代在哈佛曾从师于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克拉克洪。克拉克洪曾对当时中美洲的考古学缺乏理论和概念混乱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受老师的影响,泰勒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便致力于对考古学进行系统批判和重建,并把这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1948年出版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便是他的博士论文的完成稿^⑭。

在书的第四章,泰勒专门对考古学文化的概念

进行了论述。他提出了三个重要命题:

1. “文化”一词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整体的(holistic),另一是部分的(partitive);
2. 文化概念代表的是由思想组成的精神建筑。
3. 在整体意义上,文化属性既可是共同的,也可是独特的;而部分意义上则必须是共同的。

在第一个命题中,他指出所谓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本能的或自然的特性以外的所有“文化现象”。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人工制品,无论是否具有共性,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对真假石器的区分,实际上就是在区别他们是“文化的”还是“自然的”。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区分,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所谓部分意义上的文化即是指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即具体的一个文化。它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整体,例如爱斯基摩文化,西欧文化等。考古学家在区分出了“文化的”现象以后,应该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看它们可否组成“一个”文化。

从第二个命题出发,他认为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但这种抽象的精神建筑却可以通过人体的行为系统外化为可观的结果,这种行为结果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表现形式,诸如斧头、汽车,后者如音乐的音调与音律、舞蹈姿态等。行为和行为结果来源于文化,但却不等于文化,文化是非经验的,只能靠推理才能得知。泰勒由此认为,所谓“物质文化”的概念是荒谬的。“文化是不可观的和非物质的,即便行为,虽然看得见,也是非物质的。只有当我们进入第三个级别即行为的结果时,才会出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范畴问题。但这一级别只是由文化的物化形式组成的,并不构成文化本身。所以,“物质文化”一词是一个错词,而物质和非物质的二分法只与文化行为的结果有关,并不与文化本身相连”。

泰勒对美国考古学中把考古遗存的组合当成一个文化提出来批判,但他却并不反对对遗存进行分类研究,他自己也提出了一套划分考古遗存的范畴,如“形制(form)”、“类型(type)”、“级(class)”等;他也不反对考古学能够对古代的文化进行划分,相反,他认为通过一定的方法,考古学可以重建古代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本身,只不过他所谓的文化不是一般考古学家所指的物质遗存或组合,而是指从这些材料推论出来的精神。

泰勒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批判虽然尖锐,但却并不彻底,在方法论上虽然有一定的改进,但在研究目的上仍未能脱离传统的文化历史学派的大框架。他的根本目的仍然是重建古代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本

身,也就是他所说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历史。这就决定了他的批判是缺乏力度的。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学者都只把泰勒的批判做为对传统历史化学派的反抗,但不认为他是“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创始人。

以Binford为代表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却不同,强调考古学的目的是解释文化的变化过程和规律,而不是描述和重建文化本身。根据新进化论理论,他们将文化分成技术、社会组织和精神思想三个部分,认为文化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和周边的人为环境^⑮。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过程主义考古学家们根本忽视对考古遗存的时空分布的描述和重建,注重的是设计出各种方案和技术,来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他们注重的研究课题包括环境变化、贸易和交换、居住风格、社会组织复杂化、遗址的功能和形成过程等,目的都是为了回答“为什么”(why)这一考古学的最高层次问题。

就在同一个时期,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在英国也受到了批判。丹尼尔(Glen Daniel)则认为柴尔德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顺序给搞错了。丹尼尔提出考古学家应该先研究文化群,然后再研究单个文化。丹尼尔告诫人们:“现代考古学家所谓的文化和前人的时期和阶段一样,仅仅是一种概念工具”。工具决不是目的,史前考古学决不应仅限于对所谓的文化单位的描写。丹尼尔大声疾呼:“现在已是史前学打破沉闷的文化罗列的时候了^⑯!”克拉克也是柴尔德的批评者,认为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分类和变化原因的探讨不够,他发展出了一套经济考古学的方法,强调用经济风格的变化来解释考古学文化的变化^⑰。

不过,英国和美国的这些早期的批评并没有撼动柴尔德考古学文化理论的基础,即考古学文化是一个分类概念,是对考古现象的时空变化风格的描述。批评的焦点是柴尔德对文化变化过程关心不够。其实,在这一点上,柴尔德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而且,随着理论思潮的变化,他本人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⑱。

五. 当代考古学对文化概念的扬弃(1970年代后期~现在)

真正对“文化”概念形成根本性冲击的,还是在1980年代以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风格”(Style)概念的引入;
2. 文化作为能否作为一个考古实体(entity)被怀疑,大部分学者否认这一实体的存在性;
3. 族群(ethnicity)、认同(identity)和考古物质

文化所反应的社会界限(social boundary)的讨论。

风格概念引入到考古学中,首先是由美国学者进行的。其中下面三个学者的贡献最大:乌斯特(M. Wobst),瓦斯那(P.Wiessner),桑肯特(J. Sackett)

风格(Style)概念的引入考古学并得到发展,既要归功于过程考古学对文化系统的分析,同时也要归功于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物质文化是有符号意义的,物质的风格可以反映文化或社会现象产生的背景。后过程主义尤其强调人类从古到今,都有意识地利用物质表达文化范畴、划分社群和文化界限、构建社会结构。

考古学理论思潮上的这些变化,为风格概念的引入奠定了基础。1977年,乌斯特(Wobst)率先用信息论的理论(information theory),提出风格的产生就是人类文化信息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的结果。风格行为包含多方面的信息,包括认同(阶层认同,社会群体认同,职务等级认同等)、所有权(copyright and ownership)、宗教和政治合理化,甚至个人情绪。也就是说,风格是具有多方面功能的。考古遗物的风格可以通过传递这些信息,来促进社会互动^①。

乌斯特的这一理论对过去30年来的西方考古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这一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原理上理清了为什么物质文化可以反应族群或个人的社会界限,即风格是人们有意识地再传递某种信息。这就突破了以前学者只是描述和发现考古学文化的怪圈,使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上升到可以解释的高度。风格概念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物质文化时空变化的方法。

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30多年中,西方考古学探讨风格的文章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而且,由于过去三十年来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艺术历史、甚至国际政治学对族群界限问题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考古学界关于风格的研究,又和族群、认同等问题融合在一起。这一热潮对考古学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有一为很有名的美国考古学家孔肯(Conkey)在1990年声称:考古学“离开了风格,我们已无话可谈,也无问题可解决”^②。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西方考古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他传统课题的研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风格理论。实际情况是,通过三十年来的争论,西方学者对风格的理解不是逐渐趋同,而是分歧越来越大。风格到底是什么?风格与功能的关系如何?风格与技术是什么关系?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应族群界限?西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瓦斯那(P.Wiessner)在1983发表的文章中,用风格理论来解释Kalahari San人石箭头的风格,提出将物质文化中的风格分成两类:象征风格(emblem style) & 断定风格(assertive style)。前者是物质文化中可以反应一个群体的有意识的归属和认同的特征,而后者则是表现个人,即个人的特殊性。瓦斯那非常乐观地指出,如果方法得当,考古学家完全可以在他们所研究的材料中,区分出群体风格和个体风格。但相比之下,群体风格更容易区分^③。

瓦斯那的这两个概念和分类标准立即受到了桑肯特(Sackett)的攻击和批判。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通用变体”(Isochrestic variation)。桑肯特不同意瓦斯那的二分法,而提出物质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反应族群特征,因为它们就是在分离的族群环境中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个人风格,所有遗物的风格都是具有族群特征的,因此,风格可以作为族群的代表性特征^④。

美国考古学界上述关于风格的讨论,对欧洲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用风格理论来清理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申南(Stephen Shennan)1989年在给他自己编辑的一本论文集所写的序言^⑤。申南逐条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

1. 用文化来概括考古遗存的空间分布只能是服务于暂时的描述性的目的,但作为分析工具只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2. 考古学文化不是一个真实实体。它与族群(ethnicity)不是一个对等概念,因为族群是指一个社群有意识的自我认同。有四个原因可以证明考古学文化不是一个真实体:

① 考古学文化之所以被当做实体,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学者们人为它与“部落”(tribes)或“社群”(societies)对等。而实际上,考古学文化是不等同于部落或社群的,而且根据人类学的研究,部落或社群也不是一个真实体,而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不断变化的概念。

② 考古材料的空间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每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某种器物的特征受制于该器物的功能、制作技术、使用者的地位等。将考古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就会导致忽视对这些因素的分析;

③ 从经验的角度讲,只要考古学家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就会发现,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泾渭分明地划分开来的,实际情况是往

往有交叉。柴尔德实际上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做法是将那些与某一文化的主流特征不符合的遗物或遗址剔除出去。

④ 文化概念开始被引进到考古学中来,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也表明考古文化不是一个客观实体。

3. 考古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角色来对待,因为它不是一个真实体。以前的学者将考古文化作为历史角色来对待,是因为错误地将文化等同于族群,同时用被很多族群反过来用于声明对于某一地区的合法拥有权或影响权。

4. 考古学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引进到考古学中,就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当代的某些地区的考古学家对考古文化的建立之所以有兴趣,更多地也是出于政治目的。

那么,如果我们抛弃文化概念,考古学家又该如何研究考古材料所表现出来的时空变化现象呢?申南也承认人类的行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而且在当代世界中,族群现象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考古学家应该去研究这些问题。申南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

1. 将文化现象分成不同的构成部分;
2. 使用风格作为分析概念;
3. 用达尔文模式来解释考古材料空间变化的原因。

关于第一点,申南主张使用宾佛特的理论,将文化现象分成对自然环境、社会和意识形态多种因素的适应;关于第二点,申南建议使用瓦斯那的群体风格和个体风格概念;关于第三点,申南认为,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讲,一个地区的人们之所以选择某种文化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对族群的存在和发展有利,或具有选择优势(selection advantage)。这种文化行为往往会代代相传,在考古材料上就会产生区域差别。申南相信,只要这三点都研究到了,考古学就可以进行族群的历史重建。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传统考古学文化观念在西方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反对传统的名称,更不主张把已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全部取消掉。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考古材料的时空特征是一个基本现象,考古学家必须要用某种名词或单位来描述这些现象。事实上,大多数学者仍在使用一些老名称,如那吐夫(Natufian),拉皮塔(Lapita),哈拉巴(Harrapa),玛雅(Maya)等。哈佛大学教授Lamberg-Karlovsky就坚决反对将考古学所观察到的时空现象当做不可界定的实体,更反对将族群当做一个漂浮不定的概念。他提出,如果考

古学连一个最基本的时空单位都界定不了,其他一切研究都是不可能的。但他同时也肯定了上述学者为解释这些时空单位的形成所做的努力^③。

六. 文化概念与中国考古学

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自1959年夏鼐将柴尔德的考古文化命名法介绍到中国来以后,这一理论便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建立新考古文化、完善某个区域内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对文化进行再细分类型来进行的。虽然学术界认识到了不同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同一个考古文化是不一样的,因而在名称问题上往往争论不休,但在理论层次上,基本上缺乏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探讨。

1980年代中期,在俞伟超、李伯谦等先生的推动下,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④”。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要把一个遗址或文化内的遗物进行分组,并进而辨别哪些是本地区的,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混合物。这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内因和外因都要考虑。但遗憾的是,这一方法论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对比,大多数研究都用简单的“文化交流”或“影响”来解释外因的出现。所以,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考古文化的概念范围。

而实际上,以中国考古材料之丰富、文化现象之复杂,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文化理论上为世界考古学作出独有的贡献。只要我们在解释层面上多做探讨,以实际材料来探索考古材料时空现象的形成过程,我们就有希望对考古学的这一最基本的课题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注释:

①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②、⑧ Daniel, G.—1975,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 2nd ed. London, Duckworth.

③ Clark, J.—1932. The Mesolithic Age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⑤、⑦ Trigger, B.—2006.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s.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 Daniel, G.—1981, A Short History of (下转第012页)

(六) 以进一步加强文博信息报送为着力点, 不断扩大江西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影响

各地要深入挖掘、充分展示、大力宣传文化遗产所凝聚的深刻内涵, 将其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要积极宣传博物(纪念)馆免费开放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积极宣传江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新进展新发现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新举措新成果; 广泛宣传人民群众关心、关注、支持文物保护工作的先进事迹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继续开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 精心组织开展好“5·18 国际博物馆日”和第三个“文化遗产日”等大型宣传活动; 继续加大与《江西日报》和江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宣传协作力度; 继续做好向《中国文物报》和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市县文物部门要加强文物信息通讯员队伍建设, 今后文物宣传将作为各地年度文物工作考评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通过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活动, 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责任编辑: 周广明)

(上接第 107 页)

Archaeology.London,Thames and Hudson.

⑨、⑪、⑬ 焦天龙:《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东南文化》1991年6期;

⑩ Childe, V.G.—1929.The Danube in Pre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⑫ Childe, V.G.—1956a.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b.Society and Knowledge:The Growth of Human Tradition.New York,Harper.

⑬ Willey, G. & J. Sabloff.—1993.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3rd edit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

⑭ Taylor, W.—1948. A Study of Archaeology. Memoir Serie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 69. Menasha.

⑮ Binford, L.—1962.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 28: 217- 25.

——1965.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process.American Antiquity 31: 203- 10

⑯ Daniel, G.—1975.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2nd edition. London,Duckworth.

⑰ Clark, J.—1952.Prehistoric Europe:The Economic Basis.London,Methuen.

——1957.Archaeology and Society.3rd edition. London, Methuen.

⑰ Wobst, M.—1977. Stylistic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For the Director: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B. Griffin (C. Cleland, ed.), pp. 317- 342. Anthropology Paper 61,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⑳ Conkey, M.—1990. Experimenting with style in archaeology: som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Uses of Style in Archaeology, edited by M.W. Conkey and C.A. Hastorf, pp. 5- 1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㉑ Wiessner, P.—1983. Style and social information in Kalahari San Projectile Points. American Antiquity, 48(2):253- 276.

㉒ Sackett, J.—1985. Style and ethnicity in the Kalahari: a reply to Wiessner. American Antiquity, 50(1):154- 159.

㉓ Shennan, S.—1989. Introductio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S. Shennan ed.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 Pp.1- 22. London: Unwin Hyman.

㉔ Lamberg-Karlovsky, C. C.—1997.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Archaeology.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18(2).

㉕ a.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出版社,1987年。b.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文物报》1988年11月4日。